



全球南方的使命与实践

王 战

二、全球南方的工作与方法

在加快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如何参与全球南方工作?首先,必须回应国家战略需求,通过咨政服务为国家对外合作大局贡献力量。为了做好咨政工作,我们要与战略决策部门联系沟通,聚焦现实中的热点问题或重大事件,通过长期积累的经验作出判断并给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展示智库工作的水平和质量。在研究全球南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要做到以史为鉴、关照当下、展望未来。要有问题意识,带着思考去了解和分析南方国家近期的热点,特别是对我国会产生负面影响

的重大事件,给出合理的对策建议。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一方面需要耐心,另一方面要善于沟通。获得课题后第一时间查阅资料,对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后再进行分析判断。如果其间有不懂或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及时联系和沟通。只有真正弄懂了对方的需求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企业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看似小事,但处理不慎则会酿成大祸。在海外工作不仅需有专业知识基础,还要有扎实的外语功底,更需要具备跨文化交际本领。只有复合型的管理者才有综合驾驭的能力,以应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给出解决方案。

在南方国家做研究最重要一点就是收集数据,尽可能地避免使用二手资料。因此,必须到对象国做田野调查,通过民意测验、问卷调查和访谈座谈等工作收集需要的资料。田野调查前要与合作单位反复联络沟通,确认出访的时间、地点和访问的人次等细节。

三、全球南方工作的成果产出

全球南方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撰写智库报告,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研究报告必须来自第一手资料,不能用过往的文献。采访获得的数据和资料必须分类存档,为研究报告的撰写提供支撑。研究报告的基础是实证研究,其核心是以问题为导向,田野调查获得的数据资料都是真实且有效的一手资料,具有原创性的证据能够有效地支撑创新性的观点。

研究报告的重要功能是为党和政府的战略决策提供咨询,因此具有文以辅政的特点。既要

要对大国博弈、民族冲突等结构性问题进行跟踪和分析,又要对边界冲突或政局动荡等突发性事件进行判断。关于对策与建议,最好

事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再选择一个切入点展开分析。

四、全球南方的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全球南方工作的重中之重。培养为国家制定战略的智库型人才,乃百年之大计。因此,具备战略眼光、关注现实并提供对策建议的高水平和实战型人才才是最终培养目标。在培养过程中,既要有传统教学,还要有模拟教学。要配备专业的教师团队以及有海外工作经验的专家,例如外交家或企业的高管,以达到学以致用

的效果。教学模式上也应该创新,改变以往老师教、学生听的方式,鼓励互动教学。可以要求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寻找一个热点问题开展讨论研判,围绕问题去查阅资料,以小组为单位撰写研究报告。然后各个小组介绍报告内容,全班开展讨论。最好让学生查阅不同观点,罗列出不同之处并思考为什么会有不同。这样做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分辨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差别,提高他们思辨的能力,避免人云亦云。

另外,可以组织学生到政府职能部门、国际组织、国企民企和民间社团等机构进行实地考察。在学生实习时,要进行动态跟踪,以了解实习的情况。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组织冬令营或夏令营等活动,带领学生到国外去考察,了解域外风情,拓宽文化视野,增加跨文化交际技能。

今天,世界的多极化正在加速推进,大国之间的博弈错综复杂,非传统安全威胁显现,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秩序正在重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的重要论断。在国际秩序的变化中,在全球格局的调整中,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责任的全球南方必将成为关键性的力量,南方的叙事和南方的故事必将成为世界的焦点和热点,全球南方的主张必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的方向发展。(作者为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才教授、全球南方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区域国别学学科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24&ZD316阶段性成果)

加强田野调查 扎实推进全球南方研究

孙小涵

“全球南方”源自“南方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奋斗历程,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难题和任务,对当前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有着相近的看法和诉求,是全球南方大家庭的天然成员。正因如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报告明确将中国列为全球南方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膺担当”。加强全球南方研究,有助于持续提升全球南方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对于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田野调查作为获取一手资料的重要方法,在推动构建中国的全球南方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国内的全球南方理论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全球南方概念的阐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全

球南方观研究、全球南方话语和传播体系构建等方面。但是学界有关全球南方发展现实的研究深度仍有待挖掘。比如,学界对于全球南方崛起现实意义维度的阐发、对于如何更好体现全球南方的代表性等都亟须不断深化;再比如,对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给全球南方带来挑战的研究成果很少且较为零散,全球南方应对挑战的战略思路还需要系统化、体系化;对于“全球南方现代化”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耕和扩容,等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些问题的破解都需要研究人员走出书斋,走进全球南方的现场,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取得实证研究的鲜活素材,从而增强理论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话语构建的实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这不仅为构建中国的全球南方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引,也为深入开展全球南方研究提出了科学方法。通过赴全球南方国家开展田野调查可以使我们在实地调研中获取一手资料,用亲身经历加强对全球南方国情现状的认知,从而真正立足中国学者视角、产出体现中国智慧的全球南方现代化方案。

田野调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全球南方声量逐渐扩大,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经济合作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间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全球南方国家在减贫、改善民生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存在共同话题。唯有深入了解、分析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勘验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点、难点,才能拓宽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广度,挖掘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深度,在南南合作框架内推进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更好地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

田野调查更是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亲的关键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通过赴对象国开展田野调查,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者”,同时也向对象国家人民展现中国气象。这样可以让

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促进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友好往来。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整个世界处于一种大发展和快速转型的动态调整期。同时,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世界格局的新版图日益凸显,南北之间表现出相对均衡的状态。全球南方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在国际社会中正群体性崛起,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必将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纵观历史可发现,长期以来由北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秩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全球南方正在打破这个惯例,不再对强加于己的游戏规则唯唯诺诺,而是堂堂正正正大光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在此消彼长的国际格局下,南方与北方竞合关系日益凸显。

一、全球南方的起源与发展

1926年,意大利学者葛兰西为反对西方列强在世界肆意推行的殖民霸权主义行径,提出了“南方问题”的概念。其宗旨是反对殖民者的统治,唤醒被殖民国家进行反抗,以便最终获得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联合国在1974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中特别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大家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为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围堵,将战略重心转向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了全面的友好合作。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我国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以取其精髓、去其糟粕的胸怀开始了解和接触外面的世界,通过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治理经验,很快就进入新兴国家的行列。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奋斗,中国人民终于一步一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新世纪到来之际,全球南方大部分国家的发展目标还停留在解决温饱 and 生存层面。2024年,世界经济增长达到3.2%,北方国家是1.8%,南方国家则为4.2%。南方国家在绿色低碳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表现可圈可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今天,南方国家拥有的比较优势越发明显。全球南方无论在产业链还是供应链,在生产还是出口方面均增速迅猛,劳动密集型向高科技型模式转型也可圈可点。在关税减免等优惠政策支持下,企业大大降低了生产和营运成本并

获得投资的高回报。大量资金的涌入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实力日益增加,文化软实力也在不断强化,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将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打造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健康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有助于不同国家跨越分歧、构筑长期稳定的信任基础。伴随国际格局深刻变革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人文合作愈发从边缘补充上升为核心议题之一。全球南方人文合作根植于去殖民化进程,兴起于万隆精神,成熟于新时代的共同发展诉求,其核心是通过文明互鉴实现发展经验的多元共生,本质是全球南方国家通过文化纽带实现集体赋权的过程。全球南方人文合作的理论发展,体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知识文化体系的反思与超越。它主张知识生产的民主化,突出跨文化对话的平等性,强调发展经验的语境化。中国在推动全球南方人文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历史渊源:从“反殖民”到“文化自觉”与“文化协同”全球南方人文合作有着深刻的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渊源,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进程相伴相随。依附、世界体系、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理论等构成了全球南方人文合作的学理基础。全球南方人文合作植根于反殖民主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殖民体系导致全球南方对全球北方严重的依附。人文领域的合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单向、服务于宗主国利益的。这种模式被“依附理论”所深刻批判,认为全球南方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对于北方国家的依附。“新依附理论”进一步强调,这种依附是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的综合体现。全球南方人文合作极度受制于技术、知识和文化的依附。打破依附、实现自主发展,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人文合作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具。

全球南方人文合作发轫于文化自觉。1955年的万隆会议不仅在政治上宣告了不结盟运动的诞生,更在文化上强调了“亚非精神”,此后的全球南方人文合作内涵更多地体现为文化自觉和逆转边缘化。世界体系理论从更宏观的视角解释了全球南方的文化边缘化。尤其是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型,分析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结

构性不平等,指出边缘国家虽具有主观能动性,但在文化领域也面临被同化与边缘化的风险。全球南方人文合作正是要摆脱文化边缘化,突出自身文化特性。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则揭示了西方的文化

与话语霸权机制,认为西方通过媒体技术垄断和内容控制输出价值观,在全球南方国家构建了“被看”的“他者”形象,阻碍了南方国家文化主体性表达。全球南方人文合作正是要打破这种单向的文化传播模式,构建多向、平等的传播机制。

全球南方人文合作着力于文化协同。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南南合作推向新高度,全球南方在教育、科技、文化等人文领域的合作加速发展。“后殖民理论”强调文化协同性,为南方国家打破文化霸权与二元对立、构建平等对话平台提供了理论指导。后殖民学者提出“混杂性”概念,认为文化产品不必归属单一国家,而是可以成为流动身份的公共实验场,强化了全球南方跨国文化交流的合法性。后殖民学者还提出“第三空间”理论,突出文化杂糅与协商,揭示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与重塑,增强了对全球南方人文合作中文化解构与主体性重建的理解与理论支持。全球南方人文合作正是要通过文化互鉴、文化协同,促进“多元和谐”。

现实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四大全球倡议”创新引领新世纪之后,全球南方人文合作逐渐步入多元共存、交流互鉴的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全球南方人文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基础日益牢固,合作机制逐步完善,合作转型加速推进。在此进程中,中国扮演着重要的创新者、实践者和引领者角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南方人文合作提供新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创新价值日益凸显,它超越了传统依附理论的单向批判,强调多元文明互鉴与共同发展,提出政治、安全、经济、文明、生态“五位一体”框架。其中文明维度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南方国家在人文

全球南方人文合作的演进与发展

郭曼若

领域的平等交流合作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价值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南方人文合作强调平等性与包容性,并非刻意针对和脱离全球北方,反对简单化及主动制造东西方对立,主张通过加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动态化的民心相通。

“四大全球倡议”为全球南方人文合作注入新动能。当前,凝聚中国智慧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共建美好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亦为推动全球南方人文合作提供战略引领。尤其是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主张友好交往、对话合作,消除文明隔阂和误解,促进各国人民交流交融、相知相亲以及不同文明和合共生;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成为指引全球南方人文合作的重要理论工具和理念性公共产品。

未来展望:走向多元现代化总体来说,全球南方人文合作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身份认同构建的核心路径,还是促进文明对话交流、夯实友好民意的重要手段;既是当前百年变局下全球南方增强团结、共迎挑战的历史选择,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与文明多样化的关键支撑,其战略意义愈发凸显。

短期内,全球南方人文合作虽仍面临内部差异与发展不平衡、话语权不足与外部干预、机制化水平与资源投入不足等挑战,但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全球治理格局变化、新兴技术革命为全球南方合作提供更大空间、注入新的动力。

未来,全球南方人文合作或呈现四大趋势:一是在价值维度上,继续坚持平等与和合共生;二是在主体维度上,逐渐形成国家、民间与智库等支撑的多维网络;三是在内容维度上,以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为核心不断扩展;四是在工具维度上,数字化与现代化转型加速。(作者为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天津大学全球南方研究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